

合理干預

——中國生態旅遊中的人與動物視角

張祖群 吳秋雨 賴彥麟 張耘溪 盧成鋼 賀婷婷 陳琦 趙浩天

北京理工大學設計與藝術學院文化遺產系

一、研究綜述

(一)生態旅遊中的動物熱點

在人與自然相處關係的探索中，生態旅遊成為處理人與動物關係的熱點話題。上世紀中期，全球性環境問題日益成為人們關注中心。在全世界生態保護意識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墨西哥學者 H.Ceballos Lascurain 於 1980 年代提出「生態旅遊」學術概念。此學術概念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才正式引入中國，在張旭光、郭康 (1993)^[1]、盧雲亭 (1996)^[2]、郭來喜 (1997)^[3]、張廣瑞 (1999)^[4]、吳楚材等 (2007)^[5] 等學者推動下，生態旅遊從理論框架、案例借鑒、範式引領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無論是「保護中心說」還是「居民利益中心說」，無論是「回歸自然說」還是「負責任說」，無論「原始

荒野說」還是現行國家公園(國家級公共開放性區域)旅遊，要充分延展生態旅遊的背景與國情、市

場與利益主體、資源與產品、旅遊動機與行為、旅遊目的地建設與社區增權等問題。生態旅遊具有自然舞台、旅遊蘊含科學品質、旅遊活動以生態為

依托、活動多樣化、旅遊者參與、增強人類環保意識等特徵。生態旅遊是可持續旅遊的標尺與基石。在生態旅遊相關文獻中，從 1990 年代至 2000 年文獻中出現的高頻關鍵詞為：生態旅遊、旅遊、可持續發展、遊客、自然保護區、旅遊資源、生態旅遊資源、旅遊區、森林生態旅遊、生態環境。這一階段體現學術界對生態資源開發的漸悟過程，是「生態旅遊」的初步探索和運用。從 2001 年至 2011 年，文獻中出現的高頻關鍵詞為：生態旅遊、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區、旅遊資源、旅遊、發展對策、生態旅遊資源、旅遊、旅遊發展。這一階段表明，在生態旅遊中如何正確處理人

與自然(動物)的關係日益成為焦點。基於知網數據庫，生成過去 20 年以來生態旅遊領域的十大熱

摘要：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既對立又統一，從長時段歷史縱深能夠解析人與動物從衝突對立到和諧共存的倫理學轉變。文章採用文獻綜述方法、案例分析方法、民族誌觀察方法等，選取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鄂倫春人駐地、彝族火把節三個案例，分析人與動物之間關係、發展生態旅遊潛力，實現從硬式旅遊向軟式旅遊轉變，重新塑造人與自然之間的新型統一體。研究發現：(1)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採取強烈的人工干預方式發展自然旅遊，鄂倫春人在政府有效干預下適應自然生境與文化心態，彝族火把節是人與動物的和解共處與生存智慧。(2)三者都以不同程度人工干預，最大程度上尋求人與動物和自然的平衡狀態，體現人與自然不斷磨合、不斷和諧相處的進程。(3)人類對自然界動物的態度變化濃縮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過程。人與自然之間絕非始終的對立與博弈，最終走向統一。

關鍵詞：人地和諧；人與動物；生態干預；文化調適

門關鍵詞圖譜^[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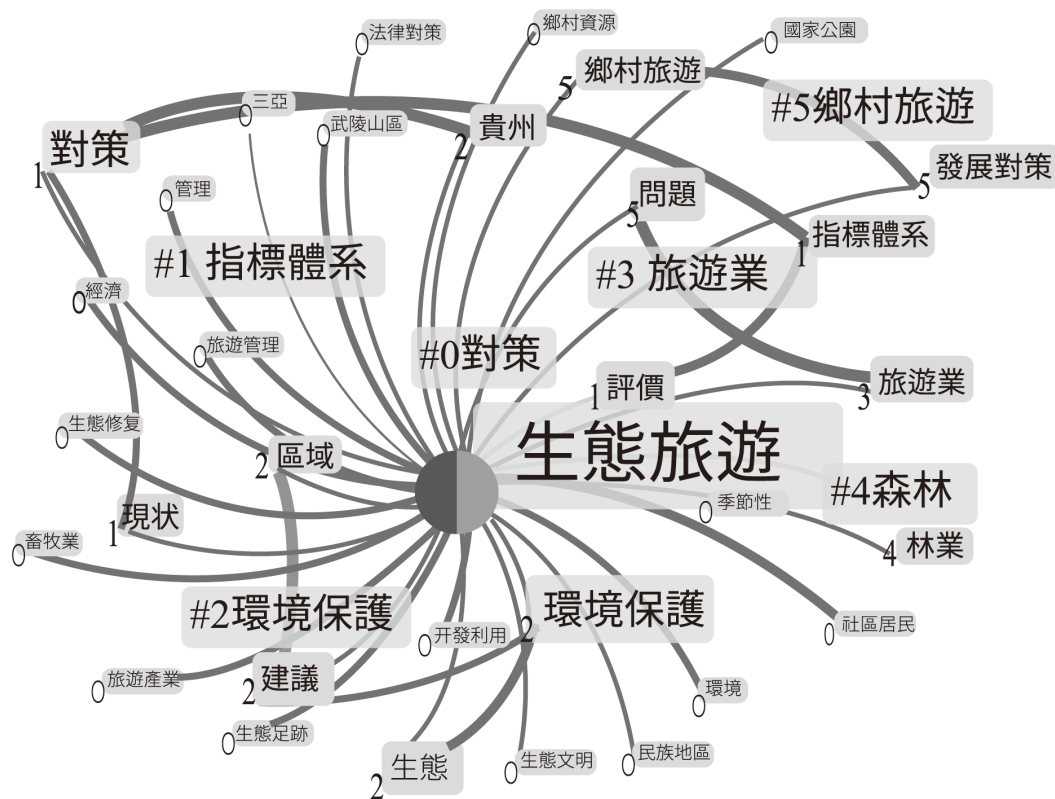


圖1. 生態旅遊的關鍵詞檢索圖譜

二戰以後，科學技術長足發展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物質福利的同時，也在開發利用自然、克服自然弊端、處理人與自然界萬物（尤其是動物）關係方面越走越深。1972年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要高度關注生態環境，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是解決環境問題抓手。1980年在東京舉行的第24屆國際地理會議上，主席懷斯教授在開幕詞中強調：「國際地理界的主要任務是要協調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7]。2016年在北京舉行以「構建我們的和諧世界」為主題的第33屆國際地理大會，設置氣候變化的全球共識、城市化和可持續發展、環境健康和社會福祉等議題。2020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以「地理：讓世界相通」為主題第34屆國際地理大會，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全球化與地方化等成為熱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用專門的篇章「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闡述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要廣泛提倡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在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8]。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征程中，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體現。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摒棄人與自然對立思維，謀劃人地和諧與綠色發展。站在改善人居環境上高度，進行科學合理的景觀設計、產業發展、文化展示等，謀求實現理想人居環境設計、營造與管理，實現自然美、生態美與文化美的有機統一^[9]。從人地關係視角來看，如何處理好人與動物的關係、如何在人地關係中尋求平衡、如何營造和諧共生的生態氛圍，已在全球地理學界達成廣泛共識。全球性生態環境條件的流變，人與自然界（尤其是動物）矛盾的起伏變動，如果人與動物關係處理不當，與自然對壘不斷，最後一定是兩敗俱傷；助推科技和經濟發展的社會機制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受到全球自然環境規律的制約；人類社會實踐需要不斷適應新的生態需求，需要避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進一步惡化。要在人類文明和動物世界、生態世界之間找到一種微妙「和諧」與平衡。

(二)「人與動物」從衝突到和諧的倫理轉變

必須承認人類具有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屬性，並且在自然界中處於極其優越的地位。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早期，人類對自然掠奪的痕跡遍地可見。在工業革命進程中，人類越來越注重本體的思考，流行「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等觀念，人類在對自然的開發與利用上越來越沒有止境。馬克思曾斷言：人類以物理、機械、化學、公路、鐵路等對自然的征服，開墾大陸，通航河流，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威力^[10]。德國著名生態學家梅勒曾直言：人類今天已經具備支配自然的絕對力量。自然成為了人類的施展暴力的對象^[11]。這樣的描述直觀地反應了人類社會征服自然之迅速。人類從自身利益價值第一和目的出發，以自我為主體進行決策與行為，導致人與自然環境關係急速惡化，隨後一系列自然災害頻發，至此人類幡然醒悟：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最終也遭到自然界無情的報復，人類開始尊重自然、保護生態平衡。要從人與自然關係的衝突走向和諧，必須順應自然規律。保護人類的財產與保護野生生物種有本質的區別。人類關心野生生物，限制對其的迫害，實際上是在恢復自然生命的整體價值^[12]。人類開始有意識保護動物，設立自然野生動物保護區，為野生動物保護立法，盡可能地保留與延續物種、遺傳與生境生物多樣性。

（三）案例分析對比視角

本文選取了可可西里藏羚羊保護、鄂倫春人狩獵文化以及彝族火把節申遺三個案例，解析在三種不同人工干預情形下，人與動物在生態旅遊場域中矛盾。(1)可可西里採取強烈的人工干預方式發展自然旅遊。藏羚羊多分布在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除了防止被盜獵之外，中國政府採取打擊盜獵、青藏鐵路建設高架橋、提供藏羚羊食物、遷徙途中安全、恢復藏羚羊生存環境等人工干預措施，延續藏羚羊生命的傳承延續。(2)鄂倫春人在政府有效干預下適應自然生境與文化心態。鄂倫春人是中國東北地區的傳統漁獵民族，在歷史的演進和馴獸文化的熏陶下，鄂倫春族人對生態自然有著樸素的敬畏崇尚情感。在中國政府的關懷關心與有效干預下，下山定居與現代生活融入，而原來作為生存技能

的馴鹿文化逐漸演變為旅遊文化展演。鄂倫春人如何適應自然生境改變，其文化心態適應成為焦點。(3)彝族火把節是人與動物的和解共處與生存智慧。彝族火把節本身是彝族人對自然與動物的和解自然觀，包含著彝族人千百年來與動物的相處方式。從火把節的表現形式、彝族神話歌謠傳統、申遺普適性理解，挖掘人與自然的變化關係。

二、案例分析

（一）可可西里的人工干預與生態旅遊

1. 背景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旅遊快速發展，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在旅遊開發、知名度提升同時的生態環境面臨著空前挑戰。1995年中國政府建立「可可西里省級自然保護區」，1996年升級為「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16年10月頒布《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遺產地保護條例》。2017年7月，「青海可可西里」以世界自然遺產類型登錄《世界遺產名錄》，是青海省第1項世界遺產、也是中國的第51項世界遺產。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對瀕臨滅絕的藏羚羊實行有效的人工干預以實現種群保護與恢復工作，成為其發展生態旅遊、認知「人與動物」關係的最佳路徑。可可西里國家自然保護區現在共設置6個生態保護站，截止到2021年的統計數據，生態保護站內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種群數量不少於7萬頭^[13]。

2. 種群特徵

雄性藏羚羊自然壽命一般在8歲以下、雌性藏羚羊自然壽命在12歲以下，人工飼養情況下可達10年。藏羚羊主要分布在可可西里保護境域東緣，通常以集群出現，每一種群的數量幾隻到幾十隻不等。一般情況下，藏羚羊多以3-10隻結成為群體進行集體活動，而在遭遇食肉類動物侵襲急需逃脫時則呈現出極有次序的雄獸在前，雌性與幼崽在後，依次跟隨的陣列。當捕食者靠近時，藏羚羊群便集體低頭將尖而硬的長角對向捕食者與之對峙，讓捕食者無從下手、望而興嘆。依據生活習性不同，藏羚羊可分為常駐固定範圍活動的定居型和定期進行遷徙的遷徙型兩種類型。每年6-7月，遷移習性的藏羚羊便「雌雄分居」行動，雌性藏羚

羊會聚集成群從過冬地方移動至繁殖地，8月份雌性藏羚羊帶領著羚羊幼崽又進行返遷與公藏羚羊重聚^[14]。遷徙活動是藏羚羊種群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五道梁—楚瑪爾河—崑崙山一帶是藏羚羊遷徙核心地段，在青藏鐵路和公路的影響下藏羚羊會在此進行短暫停留。

藏羚羊與藏野驢、藏原羚等在高寒荒漠形成食物競爭，藏羚羊更有覓食、遷徙的敏感性，容易受到青藏公路、青藏鐵路、油氣管道等人類工程擾動影響。整體上，藏羚羊種群數量仍超出藏野驢和藏原羚數量^[15]。藏羚羊基本在清晨和傍晚進行覓食，覓食時間隨季節變化的食物條件而變化，植被愈貧瘠覓食越長。藏羚羊通常會到水資源分布較豐富區域覓食禾本科和莎草科雜草、苔蘚、針茅草、地衣等^[16]。藏羚羊糞便最終又轉化為有機肥料、微生物、腐殖質回歸可可西里土地，形成高寒而貧瘠高原土地賴以再生產的有機養料。當前對可可西里科考活動中，有專人負責動物種群糞便採樣控制，以免對土地本身及其中生長的原生植被產生不良影響。

3. 罪惡的「沙圖什」

藏羚羊幼崽毛皮底絨柔軟，質地上佳，被盜獵分子視為有巨利可圖的商品。20世紀初，青藏高原約有100萬隻藏羚羊，其中可可西里地區約有20萬隻。然而到1980年代，一聲盜獵槍響打破了可可西里的靜謐，非法偷獵者大量湧入，給可可西里帶來劫難。藏羚羊絨毛極為細軟，被寓為「羊絨之王」，在波斯語中音譯為「沙圖什」。一時間，市場需求量陡然猛增供不應求。1992年藏羚羊絨在印度市場上的價格高達1,115美元/千克；1996年就已上升到1,715美元/千克，高於同等質量的黃金價格。最後他們成為歐美、印度等頂尖級的奢侈品，「沙圖什」成為財富和身份的象徵。由於市場需求的增加，原本以手工編織為主的「沙圖什」作坊手工業，發展為使用機器生產，同時擴大生產規模，致使對原料的需求量又大大增加。於是乎，在巨大利益煽誘下，商人、一道販子、二道販子、盜獵者便把「黑手」伸向了中國藏北高原可可西里^[17]。黑心商人在進入可可西里瘋狂獵殺藏羚羊獲取頸上絨毛，以發生態橫財。雖然藏羚羊活躍地區氣候寒

冷，人跡罕至，但為了牟取暴利，許多偷獵者仍然非法攜帶武器進入藏羚羊原生棲息地，或蹲伏在藏羚羊遷徙廊道節點上進行殘忍群體射擊。盜獵除了減少藏羚羊種群數量產生直接影響，也對其種群後續的繁衍造成深遠後果。根據近年來自然保護區調查：在偷獵泛濫期間，每年至少有2萬隻藏羚羊遭到非法和殘酷的獵殺。幾年之內，可可西里藏羚羊數量從20多萬隻以上急速下降到2萬隻以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調查資料彰示：1986年冬，可可西里西南的藏羚羊分布密度約為0.2-0.3頭/km²，1991年羌塘自然保護區東部的藏羚羊分布密度約為0.2頭/km²，發現至少2,000隻的藏羚羊種群。1994年在新疆崑崙山一帶調查藏羚羊數量僅約43,700頭。1995年，中國境內藏羚羊不超過50,000頭。

表1：全國與可可西里地區藏羚羊種群數量對比

時間	全國藏羚羊種群數量估計	可可西里藏羚羊種群數量估計
20世紀初	100萬	20萬
1980年代	5萬	2.5萬
1990年代初期	6-7萬	4萬
1990年代末 21世紀初	7-10萬	6萬
2021年	30-40萬	7-10萬

(資料來源：根據科考調研數據整理)

在可可西里藏羚羊遭遇慘痛盜獵的嚴峻形勢下，198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國務院隨即將藏羚羊列入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名單，嚴禁捕獵。索南達杰與盜獵者的戰爭，犧牲在可可西里。他用生命守護可可西里精靈「環保衛士」，也喚醒了人類環保意識的覺醒，引發對罪惡的沙圖什文創產業鏈的深入反思。政府、研究調查團隊、生態保護人士、生態保護區人民等各方多年的悉心努力，中國境內藏羚羊種群數量以每年約15%增速持續擴大^[18]。在立法保護、執法打擊和嚴懲不法者、恢復生境等人工干預措施下，2009年以來，可可西里國家保護區再沒有發生過一起盜獵案件，藏羚羊種群數量從2萬隻以下增加到近7-10萬隻。

自嚴厲打擊盜獵活動、保護與恢復種群工作以來，仍缺少2,000隻以上藏羚羊種群的自然觀察記錄。雖然中國政府對沙圖什貿易鏈進行強烈干預，但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對獵殺藏羚羊、走私毛皮等未列入非法清單。從印度南亞半島到歐洲、美洲的非法交易與文創產業鏈，並沒有斷絕。根據《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數據顯示，全球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愛知目標」仍未完成。不同國家之間在維護全球生物多樣性責任方面有所不同，覺悟不同，行動效果也不同，因此加強國際協作，形成多元有效的國際治理體系合理分擔生物多樣性治理的國際責任，顯得尤為必要^[19]。

4. 生態旅遊要點

生態旅遊爭論。隨著地方政府對公共資源過度無序開發，加之職能交叉重疊、行政錯位現象，導致「公地悲劇」令人觸目驚心。可可西里的生態旅遊工作方興未已，有限生態設施建設和旅遊開放程度（是否該開放、如何開放、是否允許自駕穿越棲息地）等引發爭論。(1)大規模的開放旅遊，大規模群體遊客的到來必定會踐踏當地植被草皮、採摘花卉植株，縮小生物棲息生存場地。2017年曾發生7名遊客駕駛「越野車追逐藏羚羊」，被曝光與嚴懲之後，再未發生此類事件。(2)人類活動對自然的擾動。旅遊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推進了聚落、城鎮的發展進程，但大量牧羊人遷徙，過度放牧會對環境造成破壞。(3)人類生活環境的擴張很容易導致老鼠數量的急劇增加。老鼠驚人的繁殖能力，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老鼠咬傷草根，破壞植被生長，引發可可西里嚴重的沙漠化傾向。(4)其他物種對原生態的干擾。如果不採取合理及時的控制手段，其他物種對可可西里原生態的影響將極大影響藏羚羊、羚羊等野生動物的生存，進而導致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的惡化^[20]。

生態旅遊共識。對人工干預程度進行淺析，首先，迫切需要將人類有限有效干預機制融入共生的自然—人文生態系統中。第二，保護者、規劃者、建設者、經營者、旅遊者、當地居民、商人等不同利益主體都應承擔延續珍惜物種生命、維護生物多樣性和保護資源環境的責任。第三，最大限度

降低人類活動對珍稀物種與自然棲息地干擾，最大限度地控制旅遊開發的生態干擾，尋求生態環境的干預和生態旅遊的平衡。第四，保護資源環境和發展生態旅遊和諧統一，重視生態旅遊教育和宣傳，倡導科學的遊客生態觀和旅遊體驗觀。

(二)鄂倫春人心理調適與生態旅遊

1. 歷史發展進程

鄂倫春人是生活在中國東北邊疆地區的傳統漁獵民族。他們倚靠天地自然而生，人口規模小。元朝時期在貝加爾湖以東至黑龍江以北地區生活著的「林木中百姓」或「北山野人」，即為鄂倫春人先民。崇德年間（1636-1643年），俄羅斯人擴張與侵掠鄂倫春人原生駐地（根據《清史稿》）。在十七世紀中葉後至十七世紀末，由於沙俄入侵，鄂倫春人被迫陸續遷移至大小興安嶺地區。明末清初鄂倫春族人口最為繁盛。十九世紀末，清政府為了保護興安嶺轄區，欲與內地實行同樣政策，號召鄂倫春族人棄獵從農。但清政府不分區域地實行「一刀切」政策，遭到了當地人的激進反對。同時期漢人遷居鄂倫春族聚居地，鄂倫春族人口數量急劇下降。晚清民國階段戰亂頻發，至「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東北、打壓鄂倫春人，多數已定居的鄂倫春人被迫重返山林。其生活境遇急劇下降，民族文化處於滅絕邊緣^[21]。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新中國政府有計劃將鄂倫春族群眾從山上安置於山下。1956年，黑龍江省黑河市愛輝區的新生鄂倫春鄉成立。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開墾北大荒，知青移民在此開荒種地。鄂倫春人開始以現代農耕種植業取代狩獵業，成為主要生活經濟來源。1990年鄂倫春人被國家民委列為「人口較少民族」，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僅有8,100餘人^[22]。2021年統計約9,100餘人。

2. 人與自然的關係

鄂倫春人生產生活與自然緊密相連、密不可分，不管在什麼歷史時期，他們都充滿著熱愛與保護自然的意識。尤其是在歷史早期，吃、穿、用全部來自大自然，更突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意識。鄂倫春人將自然看成自己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樸素且敬畏自然。鄂倫春人所生活的自然環境主

要植物物種有興安落葉松(*Larix gmelinii* (Rupr.) Kuzen)、樺樹(*Betula platyphylla* Suk)、苔蘚(*Moss Bryophytes*)等。(1)樺樹在大小興安嶺森林中佔50%左右。興安落葉松是鄂倫春人生態保護神，植物本身進行光合作用產生氧氣，其枯枝落葉還會形成厚厚海綿層吸收雨水，為土地滋潤，這些都為他們提供了優質美好的生存環境。(2)樺樹在大小興安嶺森林中佔20%左右。由於鄂倫春人的狩獵生活是不固定的，住房隨建隨拆，故獵人的各種用具、臨時住房及船隻必須輕便耐用。樺樹在東北深山老林隨處可見，其樹幹筆直，樹皮呈白色紙狀容易剝落。由於樺樹皮具有良好的防潮、防水、抗腐蝕性能，被用於製作各種器皿，堅固耐用。鄂倫春婦女春季剝樺樹皮，加工製作成簍、箱、盒、碗等，用它們來盛裝服飾、糧食、肉乾、野菜和食鹽等生活用品，這與鄂倫春族的狩獵文化相適應。2008年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申報的樺樹船製作技藝（序號433，編號VIII-83，類別：傳統技藝）登錄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3)苔蘚是底層植物。苔蘚類植物主要是作為駝鹿、馴鹿等的食物，由於全球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小尺度生存環境的改變，使苔蘚逐漸消失，鄂倫春人賴以生存的動物資源也發生改變。

鄂倫春人從自然環境中利用的動物物種主要有麴子(*Capreolus pygargus*)、駝鹿(*Alces alces*、*Alces americanus*)、馬鹿(*Cervus elaphus*)、熊(*Ursidae*)、馬(*Equus caballus*)。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動物肉類是鄂倫春人的主要食物，他們另食少量麵食和野菜。食用麴子肉最多最常見，以煮、燒、烤等烹飪加工為主^[23]。馬鹿除了用於食肉之外，它們的角還是珍貴的藥材。狩獵獲取的鹿茸、熊掌、麝香也賣給外界。他們早期使用鹿類進行運載（南遷後則改為使用馴養的馬匹托運）。他們使用各種獸皮製作麴皮大衣、靴子、手套、帽子等服飾和生活器具等。

鄂倫春人用勤勞的雙手和聰明才智，取物自然，愛惜自然。鄂倫春人不管是對待植物還是動物，取之有度。他們保護森林資源，對待植物樹木不會亂砍濫伐。在野外生火，多撿一些倒木或漂流木，而不砍活樹。獵捕動物也有諸多禁忌：不打幼

獸、不打懷孕母獸、不打正在交配的野獸，不對野獸趕盡殺絕。從鄂倫春人神話《天神造人》可以看出他們對生活中欲望的智慧態度以及對大自然母親的敬畏之情。他們充滿樸素而高尚的生態環境意識，無形地保護著他們所生存的環境生態。

3. 狩獵文化演進

鄂倫春人與「狩獵」二字密不可分，這是他們與自然交織出的最為顯著的文化符號。鄂倫春人狩獵文化在歷史長河中隨著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的改變而不斷演進、發展。在清朝統治(十七世紀中葉)之前，鄂倫春人一直以弓箭做為主要狩獵用具進行狩獵活動。以「烏力楞」（類似於家庭公社）為生產和消費單位，進行集體行動。外出狩獵時候，多以3-5或5-7個人組成「安嘎」（類似於狩獵隊）^[24]。後來「火繩槍」、「炮子槍」等火器傳入中國東北地區，鄂倫春人緩慢地接受新式武器、替代傳統的弓箭等。鄂倫春人自己並不具備製造工業產品能力，隨著工業革命影響和全球化進程，更為先進的鳥槍技術（如俄羅斯「不拉別克」步槍）開始傳入鄂倫春地區，其殺傷力、有效射程、射擊精度、武器保養等都較之傳統弓箭更具優點。現代火器逐漸成為主要狩獵工具與武器^[25]，鄂倫春人已經成為全球化進程中技術文化交流中的受益者、中轉者、改變者。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二百餘年中，代表血緣關係的「烏力楞」逐漸解體，轉變為地域性公社，個體家庭逐漸成為鄂倫春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鄂倫春人在狩獵以外的時間，會進行製作生產工具、製作獸皮與樺樹皮製品，形成狩獵勞動+手工藝生產活動的二元生產生活格局。狩獵品開始外銷，經濟商品化，逐步脫離了原本自給自足的模式，融入外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進程。

狩獵也衍生出鄂倫春人的多維藝術。鄂倫春人沒有自己的文字，美術、音樂、舞蹈都與狩獵、自然信仰、勞動息息相關。在2006年，黑龍江省申報的鄂倫春民歌摩蘇昆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序號279，編號V-43，類別：曲藝）。鄂倫春族口弦琴（民間音樂類型）、呂日格仁舞（民間舞蹈類型）於2007年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另外鄂倫春人的剪紙、樺樹皮鑲嵌藝術、薩滿鼓舞、鬥熊舞，口頭藝術—鄂倫春民歌

等都是體現民族文化心理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4. 禁獵、山下定居與社會文化心理變化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十分關心鄂倫春人民生活。從1953年開始，鄂倫春族人逐漸分批下山定居，家的改變讓「山民」轉變為「村民」。隨著「林木中百姓」終結，鄂倫春人形成以農、林、牧、副等多種經濟方式協調發展的複合型生計結構。很多鄂倫春老人都表示：森林沒有了，狩獵也就無法延續了。以前很容易打到夠一家人溫飽的麋子，現在再也打不到了。1996年國家為保護因生態資源與瀕危物種頒布了禁獵令，這對於以狩獵為魂的鄂倫春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禁獵令頒布之後，政府沒收民間槍支，大力扶持鄂倫春人進行農業生產，希望獵民徹底放棄狩獵業，改變生計結構。但是現實普遍情況是：鄂倫春人把村莊的集體土地、自己的承包土地轉租給漢族去耕種，絕大部分人口靠吃地租，或者做國家的護林員拿工資，領各級政府的低保補助等補助生活。真正的農業大戶只佔鄂倫春人口的極少數^[26]。

禁獵、山下定居後，鄂倫春人在心理上極度不適。仍然不願意改變傳統生活，他們對傳統的山林狩獵生活抱有極大的眷念與鄉土情結。隨著外界生活環境的巨大改變，鄂倫春人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不得不拋棄了一些原有的民俗民風。大部分鄂倫春人對種地沒有感情，終日無所事事，很多人開始變得鬱鬱寡歡、悵然若失。在寒冷地區長期生活，鄂倫春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有飲高度數燒酒的習俗，這原本是熱情而豪邁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現。現在底層民眾產生普適性的抑鬱、焦慮、鬱悶等心理現象，卻使合理飲酒變為了經常性酗酒，導致了大量成年人的死亡。酗酒、酒後鬥毆、持槍鬥毆死亡、溺亡等例子層出不窮。這些非正常死亡現象背後，反映了鄂倫春族人在現代化浪潮中對生存現狀的迷茫與不自信。

下山定居後產生了代際矛盾。老一輩鄂倫春人是傳統遊獵文化信仰的堅定維護者，他們在下山定居、被沒收獵槍之後，看不到原來茂密的森林植被和隨處可見的動物。他們不願接受現實，很多老人表示：「物質生活是比原來好多了，但是魂丟

了。多少年了，老百姓對外面變化啥都不知道。只知道地值錢了，氣候好了，都種地，往外出租，搶地種。有錢的人，都搶瘋了，現在連點綠色都沒有了。」^[27]原本堅信「萬物有靈」信仰，在現代化進程中被衝散。很多人在鬱鬱寡歡中，茫然無措，酗酒致死。年輕一輩成長在「山下定居」環境中，一邊憧憬著城市裡的生活，嚮往現代化設施，一邊開始鄙夷、輕視自己原本的文化根脈。年輕人很少有人願意學習鄂倫春族的傳統技藝，他們與老一輩之間產生文化代溝，也與外界融合中產生抵牾。

5. 生態旅遊與文化調適

鄂倫春人的精神所在是大自然，這是一個看待自然比什麼都重要的民族。他們深知不愛護自然，人類必將毀滅。發展當地生態旅遊需要考慮以下幾點：(1)自然生態環境恢復與文化生態系統持續保障應該成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大興安嶺地區的開發雖然為國家建設貢獻了源源不斷的木材，但是也造成了森林覆蓋面積減少、工業污染嚴重、環境退化等負面後果。應該禁止森林無序砍伐，阻止對生態破壞。退耕還林，植樹造林，增加植被覆蓋率，保護生物物種多樣性。建立生態博物館，建設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2)高度重視現今鄂倫春人的心理不適、代際矛盾等問題，通過心理調適使其適應現代化語境變遷，拯救他們的民族文化。要解決鄂倫春人內心茫然與矛盾，就要進行合理人工干預，幫助他們重拾對自身文化的自信，讓他們在都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中找回原本的信仰。社會進步和科技交流在本質上不會傷害原有的文化信仰，如前所述：工業革命帶來的鄂倫春人狩獵工具的變化，並沒有給原住民文化信仰造成損害，反而使鄂倫春人的狩獵生產力得到提高。如今的生計結構與生存環境發生了不可逆的巨變，需要以新的方式、新的活動，讓他們延續原本的文化，恢復和調適他們的民族文化心理。(3)發展地方特色旅遊。旅遊發展方面，以斜仁柱為載體，發展民族吃、住、遊、娛、購等特色旅遊。部分恢復玩具獵槍，發展森林狩獵觀摩、真人真槍假彈模擬狩獵等文化展演。以當地人和外地遊客共同參與，恢復與展演鄂倫春人特有的少數民族節日節慶活動。將土特產商品化，手工藝土特產商品

化，圈養的馴鹿皮毛產業化，在民族文化產業發展中讓鄂倫春人獲得實惠。從物質的樺樹皮、剪紙，到民族文化信仰等多層次出發，開發富有地方特色與民族文化內容的文創紀念品。以多重活動、多重產品與精細化管理，實現從外生型（延生型）地域生態旅遊系統向內生型（原生型）地域生態旅遊系統轉變。

（三）彝族火把節申遺爭論與生態旅遊

1. 申遺背景

彝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與古老文明的民族。彝族人皮膚黝黑、身材健碩，血液裡流淌著勇敢、憨實、堅毅的民族性格。彝族火把節每年農曆6月24日舉行，連續三天，按照「祭火-祭火-送火」開展群眾性活動：(1)祭祀火神和祭祀祖先。(2)點燃松明火把引導田間驅蟲。(3)鬥馬、鬥牛、鬥羊、鬥雞等。(4)女性選美。(5)口琴、月琴等歌舞展演。2006年5月，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合作申報彝族火把節登錄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序號458、編號X-10）。2012年，由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負責評估該申遺項目後認為：申請材料應予以補充和改進，不建議出現在申遺名單上。中國政府雖大力推進彝族火把節申遺，但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終審討論中受到巨大爭議（出現對鬥雞鬥牛鬥羊等不同理解），最終未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 節日內涵

彝族火把節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火把節在彝族語中被稱為「都則」，即是祭拜火神之意。一項非遺民俗活動總是與地緣因素密切相關，位於四川省西南的涼山彝族地區，地勢險要，縱深起伏，土地資源極度稀缺，自然條件相對艱苦。火種成為當地彝族居民勞作、生存的重要方式。根據彝族古代傳說，彝族流傳有一個先祖用火戰勝眾神的故事，彝族人祖祖輩輩對火產生無限崇拜。

彝族火把節持續三天三夜：(1)第一天為歡迎之火。每個人都會搭建一個高高的平台，圍成一圈，吃一頓會議晚餐，玩火把，一起唱歌跳舞。(2)第二天為「都格」（即歌頌火神、讚美火神之意），這是火把節三天之中最重要的活動。這一天大家

會聚集在一起開展賽馬摔跤、鬥雞鬥牛、選美賽裝等傳統的趣味活動。(3)第三天為「都沙」，大家歡聚在一起進行送火儀式。歡送火神，祈禱新年，大家幸福安康。

3. 養牛與鬥牛

彝族因為獨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崇尚自然體現在生態保護的方方面面。動物在彝族人平常生活裡佔據重要角色，在火把節等重大節日裡成為不可忽視的存在。牛是彝族農耕生產與生活負重馱物的主要畜力，彝族人形成豢養的民族特色養殖方式。以木板做有空隙的柵欄，便於通風。在干欄式建築的下層住牛，上層住人，牛脖子繫牛鈴。風吹草動牛鈴響，主人聞聲。稻草墊底，舒適乾燥。牛踩踏稻草或拉出糞尿之後，牛欄底肥可肥田。母牛在生了小牛後，會有很長一段時期的休息，彝族人給母牛充足食物（割草、煮玉米麵等），將紅繩繫在小牛脖子上，保護它們平安成長。如果一家一戶不足以飼養一頭牛，往往親屬之間或兄弟姐妹之間形成一個飼養單位，共同餵養，共同使用畜力^[28]。

彝族人鬥牛習俗歷史悠久。火把節期間鬥牛活動一般持續超過十天半月。有上百頭公牛參與鬥牛活動，參與的公牛都由主人精心飼養、精心訓練。鬥牛的風俗不僅存於火把節，在平日的傳統祭祀、喜慶活動中彝族人也會舉行鬥牛活動。每家每戶選出健壯的公牛參加比賽，以此顯示自家的養牛水平。火把節鬥牛的方式是：二二比拼，晉級一名贏家。贏家與贏家繼續挑戰，輸家被淘汰。最後挑戰所有鬥牛者，成為冠軍。鬥牛一般沒有嚴格地理場域，找一塊相對平坦寬闊的地方，眾人積聚到周圍，選取一頭發情的小母牛來將兩條鬥牛（公牛）趕到競技場，點燃戰場激情。用紅色毯子蓋住鬥牛的頭，悄悄地將鬥牛拉出競技場隱藏起來。當毯子被掀開，兩頭公牛同時發現小母牛不見了，它們會很生氣，咆哮，用前蹄挖土，或者相互凝視，以此來試探對方。兩牛互相朝對方狂奔，用鋒利的牛角相互撞擊，地動山搖，直到一方失去力量並逃跑。獲勝之牛高昂頭顱，繼續咆哮示威。一場好的鬥牛會相互撲、撞、閃、讓，激情爭鬥，互不屈服，場面極為壯觀。人們看得屏氣凝神，提心吊膽，

心裡都希望自己的牛可以獲勝，為村寨贏得榮譽。獲勝牛的主人非常高興：會迅速把勝牛帶到高台上頒獎，給牛穿上紅色衣服，並掛上彩帶，引起公眾的羨慕。勝牛與主人沾沾自喜的樣子，就像一位將軍領著士兵凱旋歸來。鬥牛也被視為選擇優良牛品種的一種形式，誰的牛勝出誰就是勤勞的動物育種專家，勝牛能夠獲得方圓幾公里之內所有母牛的優先交配權，這對生態育種和鄉土畜牧業具有積極意義。對於彝族人鬥牛來說，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和解。鬥牛並不以牛被鬥死而判斷輸贏，而是牛逃跑就會被判定落敗，主人也不會再為了泄憤去殺死敗牛。經過決鬥，彝族人對牛品種優劣進行篩選，提高牛的自然品質。無論勝牛還是敗牛，主人都會善待牛的生命，都以精心照料、好生餵養回報牛。人們在鬥牛中增強社區凝聚力與認同感，以牛為紐帶區分社區中圈層結構、人際交往，化解人際衝突。

4. 自然崇拜與動物崇拜

彝族人熱情好客，貧瘠的地理環境並沒有消磨他們對生活的熱情，他們崇尚自然，珍惜來之不易的生活，勤勞樸實積極向上。彝族人性格淳樸善良，受之自然饋贈也懂得回饋自然。從彝族史詩、詩歌的研究中，可以解析彝族先民對自然神靈的天然崇拜。彝族人崇拜的「吉爾」是他們幻想中的某些具有神奇來歷和超能力量的事物，彝族人相信「吉爾」能祛邪免災、逢凶化吉。正如彝族民間說唱能手在「克智」中所唱述的那樣：「茲莫」土司有了「吉爾」，轄區內發達興旺；德古頭人有了「吉爾」，所到之處都有人接送；畢摩祭司有了「吉爾」，石頭也會變成糧食；百姓有了「吉爾」，皇帝也會受他驅使；工匠有了「吉爾」，鍛造時能隨心所欲；笨人有了「吉爾」，說出的話都能應驗；聰明人有了「吉爾」，處處都能發揮他的才智。基於如此堅定而普遍的信仰，產生了與「吉爾」有關的種種觀念與儀式^[29]。

彝族人的宗教典籍將動物崇拜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認為青蛙、蛇、鷹、熊、猴、牛與人有著親密血緣關係，人與動物要和平共處。在彝族神話傳說中，母魚翻身造成地震，不能捕撈體型巨大的魚^[30]。彝族是虎變型的後代，死者若不火葬就不能轉

世為虎，至今有專門祭祀虎日與大門掛虎頭瓢習俗^[31]。彝族人認同人和萬物共存，與現今「善待生命、愛生命、維護地球生命」的生態倫理觀何其相似。由於宗教文化影響，彝族人生態保護已不僅是一種儀式與約束，已然成為一種潛在的良性心理意識，展現出了彝族人對世界萬物的樸素認識。歷史文明與特有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彝族特有的生態價值觀，動物在彝族人的生活世界裡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5. 火把節的文化展演

彝族地區發展生態旅遊是未來趨勢。1994年成功舉辦彝族國際火把節，成為當地人走出大山、邁向世界重要節點。2008年西昌涼山彝族火把節主題為「夏日涼爽·點燃火炬」，2022年涼山彝族火把節主題為「清涼夏日·燃情火把」，二十多年以來火把節成為彝族生活中最熱烈、最成功、最多彩、最安全的文化事件。火把節給當地文化、經濟和社會帶來巨大利益，但也帶來一定的風險。從政府主導角度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火把節對當地旅遊形成衝炮式推動，火把節之後旅遊迅速回落，無法形成穩定均衡動態發展格局。(2)景區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差。涼山州大部分景區管理機制不完善，經營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不高，配套設施建設單一。(3)旅遊網絡營銷滯後，互聯網+旅遊應用不足。(4)應對疫情等危機管理經驗不足。

彝族火把節的申遺失敗無疑失去了一個向全世界展示彝族生活世界與文化符號的機會。儘管沒有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金字招牌，但是彝族火把節的文化展演仍然在繼續，彝族文化元素、火文化元素、時尚文化元素等不斷勾勒出彝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在商業化推動下，現代潮流的興起極大地影響了傳統節日的真實性。傳統節日的意義在於傳承地方文化，激活民俗真實性，最大限度地維護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環境，並在現代化潮流中調適民族文化心理。

三、研究結論

(一) 直接結論

人與動物的倫理關係是人類自身修養和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一個真實寫照。判別一個人或一



個社會是否文明就要看他對待自然生靈的態度。物質文明與人類的精神文明不僅是並列的，更是協同進化的，兩者不可偏廢。人類與動物之間關係的倫理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人類文明進程中自身文化修養的體現。基於人與動物角度考量生態旅遊，不是自然保護和旅遊管理之間簡單結合，而是要充分考慮自然資源的有限底線與不可持續增加利用、自然棲息地破壞與恢復、保護行為與自然生態、人文生態的衝突等，最後實現周密詳實的和諧「婚姻」^[32]。本文三個案例分別涉及三種主要生態系統類型：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以草地與荒漠為主，鄂倫春人所在的大小興安嶺地區以森林與灌叢為主，彝族生活涼山地區主要以山地為主。不同生態系統的形成既有地質地貌演化過程，生物進化過程，植被演變過程，也有人文演化過程。在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力度加大之後，人類活動日益對自然要素、自然格局、自然過程產生干預^[33]，以完善不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體系，推進生態建設。對三個案例的生態干預都是以人為主導，最大程度上尋求人與動物和自然的平衡狀態，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自然干預程度最強、鄂倫春人大小興安嶺地區文化干預最強，彝族生活涼山地區兼具自然與人文干預。可可西里實現自然生態保護區並為保護動物立法，在延續藏羚羊自然

生命與維持生態多樣性基礎上適度發展生態旅遊。鄂倫春人在下山定居與禁獵之後，不斷進行心理調適，通過干預機制重新融入共生的自然—人文生態系統中。彝族火把節在申遺失敗之後，通過文化展演，維持民俗真實性。三者都是以不同程度的人工干預，體現人與自然不斷磨合、不斷和諧相處的進程。

從三個案例對比中可以看出，從硬式旅遊向軟式旅遊轉變，從大眾旅遊向崇尚自然與自由的個性旅遊轉變。生態旅遊以可持續發展為根基，充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為原則，在發展理念、旅遊行為、旅遊產品、旅遊管理等諸多方面，謀求人地關係和諧統一。以不破壞自然本體與循環等基本底線，依托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開展認知自然、科普教育、環境教育等遊憩活動譜系^[34]。保護自然風貌、體驗與感受生態之美，研習自然科普知識、參與感受自然樂趣，減少人工廢棄物、在零碳排放與碳中和中實現綠色旅遊達標。遊客合理、有限、有序參與野生（半野生）動物的人工投餵、人工招引，要以不損害野生（半野生）動物、促進種群物種快速恢復、種群接受與需要為原則，科學論證投餵食物種類、數量和方式等^[35]。以平等友愛的態度對待自然環境與動物，確立人與自然平等友善、和諧共生的新型



圖2.可可西里荒野中的藏羚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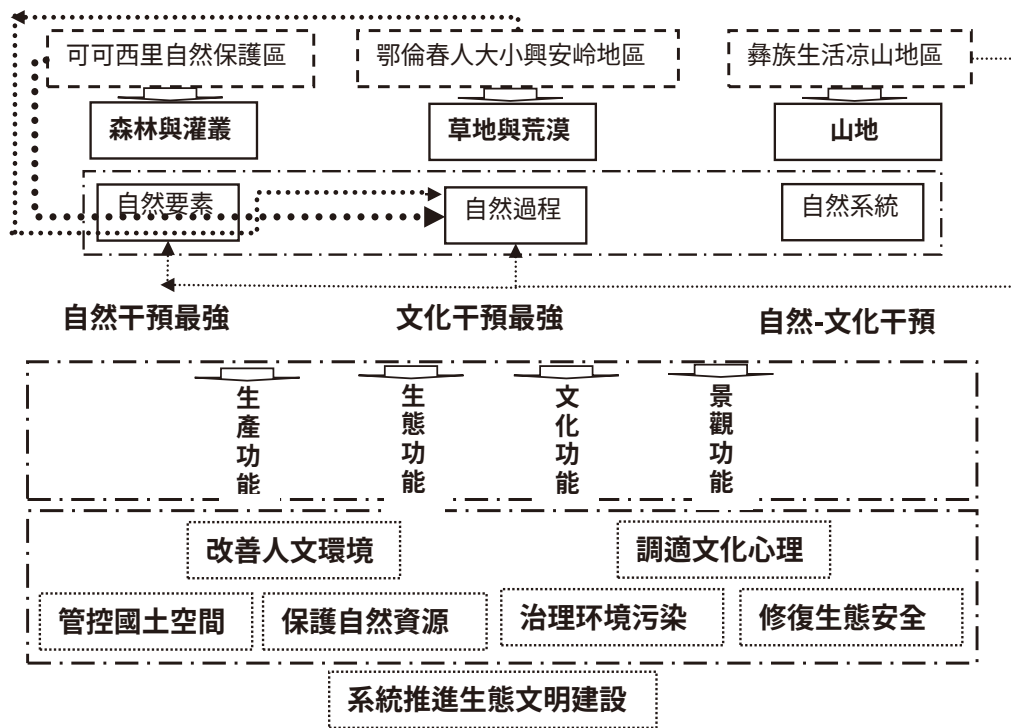


圖3. 三個案例的生態干預與生態文明建設

道德準則，充分發揮環境倫理與自然道德的調節功能，重新塑造人與自然之間的新型統一體。對自然生態系統開展保護性利用，讓自然社區所在居民參與到生態旅遊建設與管理中，使其在參與中獲益並獲得尊嚴、自信、滿足。

(二) 間接結論

在歷史早期，人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探索產生了對自然生靈的敬畏。縱觀世界歷史，東方倡導眾生平等相處、戒殺戒過度的觀點；西方同理，有以理性主義為特徵的動物工具論的倫理觀，也產生對動物憐憫、同情關懷的人道主義態度。都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樸素思想理念。

人類對自然界動物的態度濃縮著社會文明的演進過程。人類活動與自然地理環境單項因子之間的互為影響，人類活動和自然過程的相互影響，兩者相互作用的抗風險能力日趨複雜。當人類秉持自身利益高於動物利益的態度，人性中的貪婪就暴露出來，無序的索取也遭到自然界的報復。但人與動物的矛盾並不總是衝突的，兩者有相互依賴、互為存在的內在價值，人類需要自律平衡好與動物的利益關係才能最大程度實現自身利益價值，最大程度延續行星生命持續系統。人與動物從衝

突到相對和諧的轉變是生態文明的倫理建設觀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人類社會文明演化與自然文明認知碰撞出的平衡臨界點。未來人類科技的發展，必然是對自然資源承载力、風險消化能力的小心試探。緩解人與自然的矛盾，必須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將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協調起來，將人類自身生產與社會文化再生產協調起來，因地制宜地對所處環境進行合理有效的資源規劃，建立人與自然相互協調發展的新型生態文明^[36]。從經濟建設為中心、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到兩個文明一起抓，再到「四位一體」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將生態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規劃戰略中，形成「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並行協調發展的發展思路。理解生態文明之要義，成為中國從傳統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經世務實、戒奢以儉、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凡俗社會，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核心所在^[37]。

隨著現代化浪潮席捲一切，人類的生態文明觀在不斷前進，需要從技術、法律、政策等方面對生態環境保護和人類自身文化心理進行調適。人與自然萬物（尤其是動物）長期共存既是保護人類自身的利益，也是保護動物他者的利益。要實現人

與自然從衝突、相持走向協調，人與動物從衝突相殺走向和平共處，人類從自身意識上必須摒棄人類中心主義，樹立人與自然融合相生，人與動物平衡共存的可持續自然觀。人類作為自然天地的一部分，應該與生態環境和諧共處，力挽自然生態萎靡、人與動物對抗的狂瀾，推動綠水青山建設，促成生態旅遊煥發生機。人類自身來自自然、走向自然，最終也必定屬於自然。

基金項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新文科背景下產品設計專業建設的探索與實踐（2021160005）》、2021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創新項目」-「四新」建設項目《新文科背景下高校美育機制的探索與實踐》、中國高等教育學會「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規劃課題」重點項目《基於文化遺產的通識教育「雙向」實施途徑（22SZJY0214）》、2022年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教育培養綜合改革項目《藝術設計碩士新文科建設：誤區、改進與保障》

- [1]張旭光，郭康：〈社會生態旅遊區探索〉，載《經濟地理》，1993年13(2)，第77-80頁。
- [2]盧雲亭：〈生態旅遊與可持續旅遊發展〉，載《經濟地理》，1996年(1)，第106-112頁。
- [3]郭來喜：〈中國生態旅遊——可持續旅遊的基石〉，載《地理科學進展》，1997年(4)，第1-10頁。
- [4]張廣瑞：〈生態旅遊的理論與實踐〉，載《旅遊學刊》，1999年(1)，第51-55頁。
- [5]吳楚材，吳章文，鄭群明，胡衛華：〈生態旅遊概念的研究〉，載《旅遊學刊》，2007年(1)，第67-71頁。
- [6]鍾林生、李猛：〈中國生態旅遊研究熱點演變與趨勢——基於Cite Space知識圖譜分析〉，載《中國生態旅遊》，2021年11(1)，第95-110頁。
- [7]王恩涌：〈「人地關係」的思想從「環境決定論」到「和諧」〉，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1)，第84-90，121頁。
- [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載《光明日報》，2022年10月26日(1)。

- [9]光明日報記者：陳海波，章正，張蕾，張景華，高建進，王勝昔：〈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綠色發展〉，載《光明日報》2022年10月29日(8)。
-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頁。
- [11][德]U·梅勒、柯小剛：〈生態現象學〉，載《世界哲學》，2004年(4)，第82-91頁。
- [12]葉平、盧志茂：〈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倫理問題〉，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5年(8)，第14-16，37頁。
- [13]記者呂雪莉：〈全面保護讓可可西里12年無盜獵〉，載《三江源報》，2021年9月28日(3)。
- [14]殷寶法，淮虎銀，張鏡鋁，等：〈可可西里地區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驢的營養生態位〉，載《應用生態學報》，2007年(4)，第766-770頁。
- [15]殷寶法，于智勇，楊生妹，等：〈青藏公路對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驢活動的影響〉，載《生態學雜誌》，2007年(6)，第810-816頁。
- [16]曹伊凡，蘇建平，連新明，等：〈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藏羚羊的食性分析〉，載《獸類學報》，2008年(1)，第14-19頁。
- [17]宋穎，陳建偉：〈紅色沙圖什〉，載《生態文明世界》，2022年(1)，第34-41，9頁。
- [18]張志鋒，王梅：〈可可西里啟動申遺〉，載《環境教育》，2015年(1)，第47頁。
- [19]王思丹：〈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升級：困境、動能和前景〉，載《閩江學刊》，2021年(5)，第15-28頁。
- [20]崔鑫：〈自然生態保護區若干問題芻議——以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為例〉，載《農家參謀》，2017年(16)，第236-238頁。
- [21]吳春娟：〈鄂倫春族社會歷史變遷與文化傳承問題〉，載《黑河學院學報》，2020年(5)，第11-13頁。
- [22]何群：〈清以來大小興安嶺環境與狩獵文化的生態學人類觀察——鄂倫春族個案（上）〉，載《滿語研究》，2007，（1）第118-126頁。
- [23]劉曉春：〈鄂倫春族狩獵文化與經濟發展研究〉，載《首屆全國民族文化論壇》2009年2月16日，第606-620頁。
- [24]王為華：〈文化生態學視域中的鄂倫春傳統漁獵文化〉，載《學術交流》，2009年(6)，第169-173頁。

- [25] 劉曉春：〈對近現代鄂倫春族社會性質的再認識〉，載《甘肅理論學刊》，2015年（3），第67-70頁。
- [26] 何群：〈清以來大小興安嶺環境與狩獵文化的生態學人類觀察——鄂倫春族個案（下）〉，載《滿語研究》，2007年（2），第102-106頁。
- [27] 劉華芹：〈生態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以鄂倫春自治旗為例〉，載《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3），第17-24頁。
- [28] 鄧玉函，李亞萍：〈白倮彝族社會中人與牛關係研究——基於人與動物共生視角〉，載《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42(3)，第91-96頁。
- [29] 巴莫曲布嫫：〈「吉爾」考——涼山彝族靈物崇拜綜觀〉，載《民族藝術》，2000年(3)，第113-127頁。
- [30] 梅葛：《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搜集翻整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頁。
- [31] 劉堯漢：《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212頁。
- [32] 李彬彬：〈互惠共利：物種保護與生態旅遊〉，載《旅遊學刊》2018年33(8)，第5-8頁。
- [33] 石岳，趙霞，朱江玲，方精雲：〈「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形成、功能及保護〉，載《自然雜誌》，2022年44（1），第1-18頁。
- [34] 張玉鈞：〈生態旅遊：「遊」出人與自然的雙贏〉，載《光明日報》，2021年8月14日(9)。
- [35] 光明日記者：周夢爽：〈生態旅遊興起：人與野生動物該如何相處〉，載《光明日報》，2022年1月16日(5)。
- [36] 李紅衛：〈生態文明——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載《社會主義研究》，2004年(6)，第114-116。
- [37] 管寧：〈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民族文化敘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歸〉，載《學習與探索》，2021年(9)，第10-21頁。

Reasonable Intervention: Human and Animal Perspective in China's Ecotourism

Zuqun Zhang, Qiuyu Wu, Yanlin Lai, Yunxi Zhang, Chenggang Lu, Tingting He, Qi Chen, Haotian Zhao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is both opposite and unified. From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depth, we can analyze the ethic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from conflict and opposition to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ree cases(Hoh Xil Nature Reserve, Oroqen people's station and Yi torch festival) are select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animals and their potential to develop ecotourism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for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ard tourism to soft tourism and reshaping the new unit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the paper .There are some research conclusion (1) Hoh Xil Nature Reserve adopts a strong artificial intervention to develop natural tourism, and the Oroqen people adapt to the natural habitat and cultural mentality under th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Yi Torch Festival is the 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 and survival wisdom of people and animals.(2) All of them seek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imals and natur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reflect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running i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3) The change of human attitude towards natural animals condens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confrontation and gam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re not always the same, and eventually move towards unity.

Key Word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earth, human and animal, ecological intervention, culture adaptation